

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红军在黔北

HONGJUN ZAI QIANBEI

张炼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红军在黔北

HONGJUN ZAI QIANBEI

张炼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军在黔北/张炼 主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9
(遵义市党史丛书)

ISBN 978 - 7 - 5034 - 7686 - 0

I. ①红…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工农红军 - 史料 - 遵义市 IV. ①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6226 号

红军在黔北

责任编辑: 窦忠如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装帧设计: 四川世纪文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春晓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86

印 数: 0001 - 1000 册

字 数: 18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34 - 7686 - 0

全套定价: 46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028 - 61366158

46.80

遵义市党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宋晓路

副主任：张黔生 张 炼

《红军在黔北》编辑部

主 编：张 炼

编 辑：李 波 刘 畅 黄 平

张 泉

序

伍修权

1935年1月，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进入黔北地区。在遵义召开了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曾说过：“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这个结论，不仅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且永远闪耀着光辉。每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都不断地从这里吸取智慧和力量。”^①会后，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受政治局常委的委托，全权指挥红军，彻底纠正了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和突围第一阶段的避战主义的错误，坚决采取了“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的原则”^②，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特长，由被动变为主动，在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配合下，驰骋于长江上游以南，横断、乌蒙两大山系沟壑纵横、峻岭叠嶂的辽阔地区，时南时北，忽东忽西，又进又退，巧妙地迂回、穿插于敌重兵的围追堵截的缝隙之间，生龙活虎地打击敌人，最后跳出了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的胜利，谱写了长征史上最精彩的篇章。

书中对这一伟大转折时期的史实及背景并敌我态势作了较翔实的叙述，并辅以大量的文献、图片，突出红军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生动地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它仿佛又将我们这一代长征战士，带回半年世纪前那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

^① 伍修权：《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载《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第181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载《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第11页。

书中反映了当年留下的几支红军游击队，为策应主力红军转移而进行的艰苦斗争；当年寄养的许多伤病员，在群众的舍身掩护下得以幸存下来，继续革命；红军所到之处，那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各种革命组织支援红军、打击封建势力的活动；经党中央批准在遵义建立的中共贵州省工委会。这些红军播下的种子，在红军北上、反动势力卷土重来的黑暗年月里，他们怀着红军一定要回来、革命最终要胜利这个共同的信念，在血雨腥风中斗争，并经历长期白色恐怖的严峻考验，坚持了红军开创的事业。这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源泉，蕴藏在旧中国这块饱含血泪的土地里。这些方面，书中提供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料，对研究长征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遵义地委党史工委向我索序，我谈了点个人的感受，希望能有助于学习先辈勇于探索求实的进取精神，发扬英勇奋斗、不怕牺牲、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激励我们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而献身。

1988年11月9日

目 录

第一章 中央红军长征在黔北	(1)
第一节 进军黔北 摆脱军事被动局面	(1)
湘江战役失利	(2)
进入越城岭山区	(3)
通道会议决定入黔	(5)
黎平会议决定新的战略方针	(7)
第二节 突破乌江 进占遵义	(16)
猴场会议	(16)
突破乌江	(19)
智取遵义	(25)
热烈欢迎中央红军首长入城	(32)
加紧赤化黔北	(35)
第三节 伟大的历史转折	(60)
惊涛骇浪中扭转了航向	(60)
《决议》——历史的丰碑	(75)
黎明的曙光	(85)
第四节 运筹千里 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96)
一渡赤水 回旋于川滇边境	(97)
挥师北进	(97)
青杠坡战斗	(105)
一渡赤水	(111)
遵义会议期间敌我态势图	(133)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要图	(134)
青杠坡战斗示意图	(135)
二渡回师 取得遵义战役的伟大胜利	(141)



二渡赤水 回师黔北	(142)
遵义大捷	(151)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要图	(175)
娄山关战斗示意图	(176)
红花岗战斗示意图	(177)
三渡佯动 控制战略转移的枢纽	(197)
苟坝会议	(197)
鲁班场战斗	(199)
三渡赤水	(201)
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河要图	(207)
鲁班场战斗示意图	(208)
四渡奔袭 直逼贵阳城下	(214)
四渡赤水	(214)
南渡乌江	(220)
佯攻贵阳	(225)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要图	(230)
滇军东调 奇兵直下金沙江	(238)
第二章 红军游击队的斗争	(255)
第一节 活跃在赤水河畔的黔北游击队、赤水河游击队	(256)
第二节 转战于三省边境的川滇黔边区游击队	(261)
第三节 奋战在娄山南麓的遵湄绥游击队	(270)
红军黔北、赤水河游击队活动示意图	(280)
红军遵湄绥游击队活动示意图	(281)
第三章 黔北人民的觉醒	(288)
第一节 红军到 千人笑	(289)
第二节 斗恶霸 打土豪	(294)
第三节 军与民 心连心	(307)
1935 年红军在黔北时期建立的县、区乡苏维埃、群众组织、群众武装分布图	(314)
第四章 留取丹心照汗青	(323)
第一节 在血雨腥风的日子	(323)
第二节 扑不灭的火种	(327)

第三节 深切的怀念	(331)
附录：专题资料	(351)
“鸡鸣三省”地点考证	(351)
关于“三人军事小组”的几个问题	(354)
中央红军长征在黔北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司令部每日宿营地点表	(359)
红三军转战途经务川	(363)
红六军团转战途经余庆	(369)
红九军团转战途经湄潭	(374)
红军长征在桐梓	(378)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时敌军战斗序列表（1935. 1. 19—1935. 5. 9）	(382)
后 记	(383)

第一章 中央红军长征在黔北

第一节 进军黔北 摆脱军事被动局面

1934年12月18日，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黎平，由中央书记处签发了发至各军团纵队首长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红军艰苦转战，突破敌人重点封锁的第四道湘江防线之后，总人数从开始转移时的86859人（1934年10月8日红一方面军花名册所载数字），锐减至3万余人，面临敌人实行更恶毒的围歼阴谋的严峻时刻，政治局会议作出上述决定，改变了“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的原定计划；并认为“新的根据地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转至遵义西北地区。”中央红军果断坚决地执行这一决策，挥戈西进，大举入黔，将数十万敌兵抛在湘桂地域，使全军赢得了休整、补充给养、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的宝贵时间，更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作了较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指战员在长征途中反对“左”倾错误领导的一个重大胜利。

事实表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党政机关和红军主力被迫撤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大范围的战略转移，主要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在军事上一味照搬外国“洋教条”，脱离中国国情，脱离红军作战实际的瞎指挥，大力排斥了在中国土壤里萌发成长、并经过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实践所证明的一整套成功的战略战术原则，造成的严重后果。长征开始，又采取了“抬轿式”、“大搬家”、“甬道掩护”、夺路突围等一系列荒谬的作战方针，将一支富于革命光荣传统，历来以机动灵活而克敌制胜的常胜之师，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几乎难以挽回的危害。对此，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文中，作了确切的追述：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



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①

周恩来 1943 年 11 月 27 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指出：

“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

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②

这些都说明，广大指战员“达到了顶点”的不满情绪，反映出政治局成员间对关系全局的路线分歧。经过频繁而激烈的争论，到“黎平会议”作出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决定。这一新的战略决策，是经过一段艰苦复杂的较量而作出的。这是党内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红军高级领导成员，与少数凭着共产国际威信来吓人的教条主义者，在对指导中国革命的军事路线进行原则性辩论的过程。从时间和地域概念讲来，这过程是从 1934 年 12 月 1 日中央红军突破湘江直到同年 12 月 18 日在贵州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湘江战役失利

1934 年 11 月 25 日，中革军委发布突破敌人沿湘江布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红军分两路进入广西向湘江运动。这时敌人的兵力部署是：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率部共 11 个师尾追，分别进至零陵、道县、宁远一线；湘军刘建绪部 4 个师到黄沙河、全州一线侧击；桂军白崇禧指挥 5 个师布置于灌阳、兴安一线防堵。11 月 25 日晚，担任右翼后卫的红九军团佯攻龙虎关，白崇禧赶至关前督战，深恐红军乘虚深入广西腹地，急令所部撤至桂林、富川一线布防，致使兴安至全州一线空虚。11 月 27 日，红二师四团先期渡过湘江抢占界首，红二师五团、六团在大坪涉水渡过湘江，控制了从界首至脚山铺之间 60 余里地段的湘江东岸的渡河点，其中有 4 处还可涉水过江。聂荣臻回忆中指出：“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③ 同一天，军委纵队和中央机关进到距湘江最近渡口只有 160 余里的灌阳县文市，这本是急行军一天可到的路程，可是由于庞大的辎重裹足，却走了 4 天。这 4 天里，为保证军委纵队和中央机关安全通过，担任左、右翼掩护任务的红一、三军团和担任后卫阻击敌人的红五军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1 月 30 日，红一军团与多于自己数倍之敌血战整日，逐渐被压到第二道防线。当晚，军团首长在脚山铺前线致军委电中，说明在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情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日继续抗敌。”12 月 1 日 1 时 30 分，中革军委向全军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

①《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4 页。

②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摘自中央档案馆所藏记录稿。

③《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第 2 版，第 225 页。

同日3时30分，中央局、军委、总政联合向红一、三军团发出指令，指出：“1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号召全军为“开辟西进道路”，提高“人人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并提出“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红一、三军团收到上述指令，彻夜进行政治动员。12月1日，冒着敌人的猛烈进攻，敌机的狂轰乱炸，红一、三军团全体指战员，与敌人展开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拼杀。

红一、三军团在白沙、夏壁田、界首一线与敌人反复争夺，始终扼守主要阵地，奋力掩护中央纵队率后续部队在麻子渡南面经由野战军总部工兵连架设的浮桥渡过了湘江。下午4时，工兵连奉命炸了浮桥，少共国际师（1934年3月改称第十五师，归红一军团建制）被阻于湘江东岸，由红一军团派出部队接应涉水过江，担任全军总掩护。走在最后面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十八团在接近湘江东岸时，陷入敌兵重围，大部壮烈牺牲。余部300多人，在师长陈树湘率领下突出重围，转战湘南，坚持游击战争。

进入越城岭山区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12月2日，军委纵队翻过越城岭之三千界，进至西延护卫岭（今资源县境）地区。当日17时，军委电令各军团纵队，决定在西延地域作短时休整，编整序列，以便集中力量，突破东田、大埠头一线北上，经湘南城步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作如下部署：

一军团转移至杨梅道及清水江地域，对全州及咸水方向侦察警戒；

三军团转移至鲁塘、洛江，向界首方向组织强有力的防御；

五、九军团转移至南宅、田川、油榨坪地域；

八军团余部及其他部队失散人员，到达何地，由当地驻军首长指挥。

在此同时，敌“追剿”军总司令何键，遵照南昌行营籙（17日）戌电令（即1934年11月17日发布的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在中央红军已“过湘、漓水以西”时则部署围歼中央红军“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洲以北地区”。通电改定“追剿”军负责的“绥靖”区域。从12月1日起，将原五路“追剿”军计16个师又1个旅，重新组编为第一、第二兵团，以第一兵团3个师沿梅溪口经新宁至城步截击，第二兵团集结武冈一带，利用东起新宁、西至芷江、黔阳地区的211座碉堡构成的四道封锁线，阻击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调动桂军配合，妄图在城步、武冈一带进行合击。

中革军委很快获悉了这一新的敌情变化，12月3日16时电令各军团纵队脱离敌人西进，深入越城岭山区，放弃从西延地域北出湘西城步的行军计划。12月4日16时30分，军委给各军团纵队下达了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播阳所、长安堡地域的电令。这是在



中央红军面临险境时，军委作出的重要决策。这一决策的基本精神，虽没有改变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个长征开始时作出的预定目标，但却使红军在不利条件下，避开与敌优势兵力硬拼，化险为夷，达到了保存有生力量的战略目的。这是一次战术行动，但是这一行动的性质，实际上是长征以来第一次改变全部红军的进军方向，这意义就远非军中常见的某一战役中单纯的战术迂回可以比拟的。值得注意的是，长征以来，红军作战从一味强攻硬拼到避实就虚这一军事指导思想的变化，正是在红军最高指挥首脑“三人团”中，博古“一筹莫展”、“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李德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削弱了，周恩来更多地接管了工作”的时刻，这是中央红军由于错误指挥遭到惨重失败后，又得到了正确的军事指挥的一个开端。

12月4日下午，中央红军开始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高山——越城岭中段的老山界，它靠近海拔2141.5米的猫儿山最高峰。被称为“峭壁上的路”的绝壁悬崖，浓雾大风的恶劣气候，使人目眩头晕的没有栏杆的栈道，还有五百步、雷公岩等处陡险山道，终被英雄的红军彻夜攀登翻越了。12月5日，中央纵队胜利越过老山界到达塘洞，红军主力相继经油榨坪、东田进入越城岭壮、苗少数民族山区。这一出其不意的行动，再次打乱了敌人部署。红军进入越城岭大山，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当地民团收买歹徒，不断地“纵火”、造谣，企图离间红军与壮、苗人民的关系。可是，红军摆脱频繁恶仗，赢得了不同程度的激战后短暂也是难得的一点间隙时间，得到了“睡上一小觉”的“极大的享受”。也正是这时，痛定思痛，“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①这不仅是红军高级指挥员，也是广大战士心理状态的正常反应。

12月8日，军委纵队西进至东寨黄强地域，右翼一军团进至鸡公界横水寨地域，左翼三军团进至马蹄河口地域。同日21时，军委致电各军团纵队，指出：获悉湘敌主力正向新宁、武岗、洪江运动，判断其企图是“拟追我入黔”。这是电文中首次出现来自敌方的“入黔”字样。12月9日，军委电令10日军事行动：一军团先头（二）师，进占通道，向绥宁、靖县警戒；红一师从长安堡向通道进军；红九军团进入通道临口一带；十五师随九军团跟进；红三军团主力10日向通道前进，先头师进入通道后，向西通黎平道路侦察警戒；红五军团进至昌贝地域。总的方向是西进湘南。

12月11日，红二师打开通道县城（今县溪镇）。

12月11日18时，中革军委发出12日各部队集结通道县境命令，并令一军团派出“不大于一团兵力的侦察部队并带电台前出至岩鹰坡向新厂、马路口侦察入黔道路”。12月12日1时，一军团立即作出反映，电告军委：“通道到黎平185里。”

12月12日晨6时，军委纵队进至桂北边沿的流源、唇口，电令一军团经新厂、马路口，三军团经团头、播阳所之规定路线，分别进入贵州。中央红军在越城岭地域12天，只有两翼警戒部队与追击的桂军小有接触，没有打过大的硬仗，致使敌人错误地认为红军是“窜匿兴安龙胜以北山区，昼伏夜行，闻声而逃”。这正好从反面印证了红军

^①《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12月第2版，第232、234页。

采取“避实就虚”作战方针的正确。

从12月9日和11日，军委电令红军主力集结通道县境，积极侦察入黔道路，以及中央纵队尚未进入湘南通道时，红军主力一、三军团分别入黔的部署中，都表明中央红军越过桂北山区后的下一步更大的军事行动，正是在越城岭山区进行酝酿的。

通道会议决定入黔

12月12日，野战军司令部和军委纵队，从绥宁县境的流源、唇口径通道县城南的双江到达通道县城西北40里的芙蓉、金殿（今通道县菁芜州乡的新团、陈团地方），最后一支收容队也在13日撤离广西进入湘南。中革军委在芙蓉镇“一家农民的厢房”^①里召开了紧急会议，毛泽东参加了会议，这是他自1932年宁都会议后，第一次改变了“只是加里宁”^②的身份，参加制定军事决策的会议。毛泽东以卓越的见解在会上强调：“无论如何不能照原计划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了，因为敌人已调集了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主张现在应坚决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③这样竭力说服“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创建根据地。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军委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于是当晚19时30分军委发出致各军团纵队的“万万火急”电报，命令全军向贵州前进，先头红二师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3时30分，军委发出关于我野战军14日分别经黎平、洪州司进入贵州的行动部署，各军团纵队遵此命令，迅速向西运动，先头部队红二师六团在红三团配合下，14日一举攻占黎平，打开了进入贵州的门户。

就在红二师攻占黎平的当天（14日）16时30分，中革军委《关于二、六军团发展湘西活动，以配合我西方军行动的指示》中提出，“我西方军现已入黔，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表明“通道会议”之后，红军进入贵州是坚决的，但北上会合二、六军团的计划至此还未放弃。《指示》同时指出“敌在我左侧跟踪未脱”之态势，要求“我二、六军团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之目的应以主力向沅江上游行动，以便调动钳制黔阳、盘江之敌”。12月15日，军委相继发出了《关于五、八军团改道入黔的指示》、一军团“在黎平收集资料”及“二师由黎平向剑河前进”等电令；16日0时又发出《关于我军集中力量打击黔敌、开辟前进道路的指示》，则是这一部署的作战目标。

12月16日，军委电令左翼“一、九军团前出至柳霁地域，准备渡清水江”，这仍

①[美]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第126页。

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1版，第353页。

③罗明：《关于通道转兵一些情况的回忆》，载《中共党史资料》第9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99页。



是一个由西进再转入北上的行动。

12月17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纵队，改变上述部署，指出一军团“不渡清水江，改由清水江南岸西进”；三军团开向黎平，侦察入台拱（今台江）道路，向贵州腹地纵深发展，显然是放弃转入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从中革军委12月12日至17日的作战部署和中央红军的进军行动，表明“通道会议”作出向贵州进军的决定，还只是为了避开敌兵的追堵而采取的迂回作战行动，并未改变出发时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目标。而改变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这一重大决策，则是在军委纵队进驻黎平之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已见端倪，并开始付诸实行。这正是长征途中对于关系红军战略方针问题的争论的继续。湘江战役后，尤其是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经过“努力说服同志改变了观点”；可是并未被“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推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①，坚持“左”倾错误领导，个人包办“军委一切工作”，实际操有军事指挥否决权的李德等少数人所接受。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第一次改变战略方针的任务，是在其后召开的“黎平会议”所完成的。

从突破湘江到黎平会议作出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是在红军面临强大敌人的追堵，“左”倾冒险主义者坚持错误路线的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们，根据“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的作战原则及“逐步改正”的工作方法，成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使红军避免了一个又一个的覆灭的危险，扭转了被动局面。

这期间，中央红军经历了渡过湘江集结西延地域，放弃了北出仅60公里的城步不打、避与敌重兵作战而西进桂北山区，才赢得了激战后的喘息。

中央红军进至湘南通道，“当时薛（岳）周（浑元）两纵队及湘军大部集中于城步、绥宁、靖县、会同等县以阻红军北上与贺龙肖克之红军会合”^②。通道会议就在此敌军事压力尚未消除的情况下召开，与会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提出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到黎平会议召开前夕，采取乘虚而入，“改由清水江南岸西进”，将追堵敌军抛在湘桂地域。

这一系列重大决策，从具体时间、地点和所解决的问题，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从战略方针的总体思想讲来，是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的。通道会议决定打击黔敌为主攻方向，为开辟前进道路起到主要作用；而且随着敌我态势变化，不难看出进军贵州的决策，是从战术迂回发展为改变战略方针的重要步骤。

^①《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载《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第20页。

^②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红旗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15页。本书在编者按中说：“本文最早于1936年发表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当时为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作者署名廉臣，并在文中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

黎平会议决定新的战略方针

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边沿的黎平县城召开会议，会址是当年红军总部驻地，即原商人李维序家一幢两进的砖木结构房屋。据现有资料记载，会议在激烈的争论中进行了一整天。主持这次会议的周恩来1943年曾谈到：湘江战役后，对军事路线的批评，“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网罗。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①意味着李德十分孤立。

据陈云《传达提纲》记载，对于“左”倾冒险主义的“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②随着战争的失利，广大红军指战员对于李德以“太上皇”姿态凌驾于军委之上包办一切造成的严重损失，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最后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这次会议对其“左”倾错误领导和李德个人的恶劣作风，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从而肯定了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详尽阐述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战略方针的决定》，实现了长征以来的首次战略方针的改变。这次会议之后，“红军不再是经常受人攻击的对象，自己反而站到了主动地位，能够自由袭击敌人。”“这也就是西征第一阶段的终点”^③。聂荣臻在回忆中对会议作了中肯的评价：“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④

黎平会议是通道会议的继续。李维汉在回忆录中说：“长征改道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酝酿，而由黎平会议最后决定的。”“它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特别是使红一、三军团获得‘解放’，可以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五军团也不致因担任后卫，老吃苦头。”^⑤周恩来鉴于通道会议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红军的进军方向，而这又是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他首先就这次会议的召开作了周密的考虑。通道会议结束后，即离开中央纵队，随红二师先头部队于14日进驻黎平。选择了湘桂黔三省交界、地形复杂、各省地方军阀之间相互存在着错综的矛盾，并且守防黔军兵力薄弱的黎平这个地方召开会议，是很合适的。为此，又作了相应的军事布防：先令一、三军团主力分别开拔湖南靖县和广西林

^①周恩来1943年11月27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载《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第64页。

^②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载《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第41页。

^③施平（即陈云）：《英勇的西征》，载《遵义地区党史资料》1985年第1期，第6页。

^④《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12月第2版，第237页。

^⑤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351页。



溪方向警戒；攻占黎平之后，派一个师驻守，驱逐城外残敌，担任警卫任务，为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安全召开，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黎平会议的成功，是由于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为克服“左”倾错误领导作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对当时在中央工作的主要成员王稼祥、洛甫经常谈论中国革命前途等重大问题，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一同反对“左”倾错误，才促成了这一关键性的战略转变。中革军委副主席、长征开始时党和红军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主持了政治局会议。他力排非议，对李德坚持错误的顽固态度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博采良策，毅然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遵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投了这举足轻重的“关键一票”，使个人的正确意见成为政治局的组织决议，从而形成指导全党全军行动的方针。这表明了在挽救3万多红军免遭覆灭危险的战略转变中，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旗帜鲜明地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作了不懈的努力，才取得了这一重大的收获。

黎平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是对当时敌军兵力布置及各方面力量进行科学的分析后作出的抉择。当红军集结通道时，蒋介石发出“文（12日）戌电”，飭令“各军守备区域，按照篠电^①规定地点，迅速完成碉堡，严守之。”中央红军进驻黎平后，敌军调整各路“追剿”部署：敌第二兵团3个军及薛岳总部率部进驻黔阳；吴奇伟部转芷江、玉屏，一部进至铜仁；周浑元部抵会同之托口，一部进驻天柱，加紧北线的布防，阻击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敌第一兵团刘建绪部3个军先头部队，12月13日占领通道，在东线之会同、靖县间赶筑碉堡，防阻中央红军回师东进，重返湘西。敌桂军两个军分别组成的第一追击队，由西尾追至龙胜集结；第二追击队由乐屯堡转经古宜进至榕江，防阻中央红军向南进入广西。以上三个方面的敌军兵力仍居优势，对中央红军造成直接的威胁。敌担任阻击中央红军西进道路上正面战场的黔军王家烈部，是敌营垒中的薄弱环节。12月10日，红二师六团进入黎平县境，黔军第四旅旅长周芳仁率第七团，在城东之五里桥迎战，“激战约两小时”，敌“只得放弃黎平城”^②，由此可见一斑。当时贵州全省的兵力也是十分空虚的。王家烈名义上是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管辖5个师，实际上接受他指挥的只有黔北系统的2个师15个团的“双枪兵”。省内大小军阀林立，都将各自盘踞的地方视为封建领地，军令政令很难统一实施，还可以说是国民党中央势力的划外之区。王家烈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曾与两广陈济棠、李宗仁秘密订立以大烟换枪支的三省“互助联盟”，参与了西南军阀与蒋介石之间时缓时烈的暗斗明争。当发现中央红军入黔意图时，陈济棠发出“请缨追剿”的真（11日）电，并组成3个师的援黔军待命。蒋介石对此置之不理，急令薛岳部开向黔东。陈深恐此举引起蒋之猜忌，未敢贸然行动。王家烈既慑于红军的声威，又深惧蒋介石“一石二鸟”的

^①即1934年11月17日南昌行营发布的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载《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第77页。

^②《王家烈删电报告黎锦军情两则》，载《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第82页。